

戊戌百年沉思丛书

戴逸 主编 王青 著

客蒙与呐喊

泰山出版社



戊戌百年沉思丛书

戴逸 主编

启蒙与呐喊

王青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蒙与呐喊/王青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8
(戊戌百年沉思丛书/戴逸主编)

ISBN 7-5402-1118-0

I. 启… II. 王… III. 戊戌变法-研究 IV. K256.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8413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安里 3 号 100031

新华书店 经销

保定市华孚商标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214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今年，是戊戌变法 100 周年，为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戊戌百年沉思丛书”。

戊戌变法是清末具有进步意义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后，在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清政府日渐腐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1895 年康有为等通过发动公车上书，掀开了变法图强运动的序幕。以后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和报馆，宣传变法维新。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要求，颁《明定国是》上谕，并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改革的谕旨。变法历时三个多的时间，遭到以保守派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最后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距今已经 100 年，但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将永远载入史册。

100 年后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与 100 年前相比，中国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正以新的腾飞迎接这二十一世纪的到来。

历史没有如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胜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当我们翻开百年前的历史，戊戌变法的重大作用与深远影响，仍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尤其是站在时代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时值戊戌百年，由《启蒙与呐喊》、《幻灭与新生》、《梦醒与嬗变》和《戊戌百日志》组成的“戊戌百年沉思丛书”将奉献给

读者。这套丛书的作者，大多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并由著名近代史专家戴逸先生担任主编，由杨念群、黄兴涛两位先生对全书进行了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并致谢忱。

由于时间仓促，这套丛书无论从思想观点、内容叙述以及编辑质量方面，或许还存在着值得商榷与探讨之处和缺点、不足，尚希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匡正。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7

前　　言

胡适说过，研究历史的方法，就像摆一大堆铜钱，全看你怎样去摆。这句话大可诟病，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说出了一个片面的真理：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历史事实，从而揭示出历史规律。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史学传统，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那么，一部近代史，就是由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核心的主线贯穿始终，而时至今日，历史迫使我们重新反思的时候，这种框架并不能反映近代史的本质特点。

既然我们把近代史的起点放在 1840 年，这本身就很有有力地说明，近代史的根本特点，乃是中国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文化遇上了西方文化强有力地挑战。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这种挑战并不是中国所独自面对的。张光直先生把世界文明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它借助政治手段，以一种连续性的方式从野蛮过渡到文明；另一类就是西方式的，它通过技术手段，以突破性的方式进入到了文明时期。这种西方式的文明，对一切世界式的文明均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时至 19 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开始向中国的古老文明炫耀武力，中华民族面临着千年之危局。如果说，中国几度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但亡种、亡教的危险却是近代开始才必须面对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乃是近代史上的主要矛盾。而且，这种冲突和融合继续贯穿于现代史乃至当代史，成为一百五十多年以来各种风风雨雨中的焦点和核心。

明确了这个特点，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如果从拒绝、对抗，或者说侵略与反侵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乃是鸦片战争、义和团等等，它代表着防范与拒绝、义愤以及无理智的反抗。有作为有理智的爱国者寥寥无几，只有林则徐可以权且充数，另外，关天培、邓世昌等人用以身殉国的壮举成为军人爱国者的典范；而卖国者则比比皆是：琦善、耆英、李鸿章，几乎所有清朝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官员都身背千古骂名。

但从接受、融合、创新这个角度来看，一部近代史乃是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等为主要标志的、对西方文化渐次深入接受的发展史。这三次重大事件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三种不同态度。洋务运动是接受西方器艺，戊戌变法则是学习西方制度，新文化运动争论的焦点已在于是否要接受形而上的思想理论。用梁启超的说法，洋务运动只是“变器”，维新运动乃是“变法”，新文化运动却在讨论是否要“变教”了。从这个角度看，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首先，它是甲午战败后，中国第一次群体性反思的直接结果，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的民心民意。它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与融合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让人们明白光有洋务运动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痼疾不仅仅在于器艺不精；它又启发后来的人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它通过教育、舆论宣传以及一系列的举措，更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血洒校场口的悲壮，教育、浸染、激励着无数的中国人，使得中国的社会心态、社会群体、社会习俗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社会心态方面说，它使得变革进化、天赋人权等观念深入一代乃至数代人的思想，最终使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理论上的根基；从社会群体这方面说，它推动了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并使这个群体大大壮大，成为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最活跃、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近代、现代乃至

当代的大部分重大变化，几乎都是由这个群体中的人物所策动、所完成的；在社会习俗方面，它至少起到了破除许多旧习俗的重大作用。这些，都是本书需要详细分析的。

更重要的是，戊戌的变革精神，透露出中国这一古老民族再生、复兴的无限生机；而它的失败，也昭示着中国这一古老民族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将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国现代变革的大背景下，仍然有必要反思戊戌变法这一百年前的壮举。在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又重新面对一百年前的前辈曾经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重新回顾历史，显得尤为必要。

目 录

第一章 耻辱的开端.....	(1)
一、衰亡的征兆.....	(1)
二、以夏变夷.....	(2)
三、睥睨与防范.....	(5)
四、严禁鸦片.....	(10)
五、必败的战争.....	(16)
六、主战与主和之争.....	(19)
七、无知与昏庸.....	(23)
第二章 开始解体的木乃伊.....	(28)
一、昂贵的收获.....	(28)
二、鸵鸟政策.....	(30)
三、亚罗号与马神父事件.....	(32)
四、兵临京城.....	(33)
五、先驱者们的维新思想.....	(38)
第三章 屈辱与惊醒.....	(46)
一、相同的遭遇.....	(46)
二、鲜明的对比.....	(47)
三、惨败的战争.....	(52)
四、耻辱的结果.....	(55)
第四章 变法领袖康有为.....	(58)
一、南海圣人.....	(58)
二、思想学说.....	(62)

三、公车上书	(72)
第五章 百日维新	(77)
一、失落的皇权	(77)
二、复杂的派系之争	(80)
三、与帝党联手	(83)
四、空前的改革	(90)
五、变法失败	(100)
第六章 维新第一大事	(105)
一、千年遗毒	(106)
二、从八股到策论	(113)
三、早期新式学堂	(118)
四、万木森森一草堂	(125)
五、梁启超与时务学堂	(131)
六、新式学堂的制度化	(135)
七、永恒的遗产	(143)
第七章 占领舆论阵地	(147)
一、送来的工具	(148)
二、设报达聪	(153)
三、报刊三重镇	(157)
四、维新喉舌	(162)
五、海外办报	(166)
六、舆论界之骄子	(170)
第八章 合群以结同志	(181)
一、从文人结社到近代学会	(181)
二、南北强学会	(185)
三、学会林立	(187)
四、保国会的兴衰	(191)
五、谭嗣同与南学会	(194)

六、近代学会的意义与影响.....	(199)
第九章 近代史上的观念转变.....	(202)
一、西学成为时尚.....	(203)
二、变革不可阻遏.....	(209)
三、专制动摇根基.....	(215)
第十章 新知识群体的发展壮大.....	(225)
一、另一个角度的社会分层.....	(225)
二、从士大夫到新型知识分子.....	(234)
三、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	(237)
第十一章 传统陋俗的革新.....	(242)
一、不可抵御的物质文明.....	(242)
二、禁缠足.....	(246)
三、兴女学.....	(254)
四、变婚俗.....	(257)
五、易俗延年.....	(259)
六、变发易服.....	(262)
七、倡议改元.....	(265)
结论.....	(269)
后记.....	(271)

第一章 耻辱的开端

一、衰亡的征兆

时间跨入 19 世纪的最初 40 年，一个由满族人建立起来的朝代度过了其最辉煌的时期，走到了被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称为“盛清”的最后阶段；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也即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天下几乎没有人预感到这一点。这 40 年内的两位皇帝嘉庆与道光，尽管没有其父、祖乾隆那样赫赫的文治武功，但也决不是庸碌之辈。朝野上下，尽管政治极度腐败，但依旧一片歌舞升平，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清帝国的“内囊已经尽上来了”。

只有一个人，中国最出色的文字学家之一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末世气氛，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不是“大川归道”、“王邑文明”的美好安稳的年头了，而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帝国黄昏了。他以一种忧危的心情注视着帝国的种种弊端，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不十年惧或烦兵事。”⁽¹⁾一语成谶。

当然，龚自珍没有料到，这兵事首先并非来自他所担忧的帝国内部，而是来自于遥远的海外，一个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根本不知其在何处的蛮夷之国。自从这个蛮夷之国用大炮轰开了帝国

(1) 《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著议第一》。

的门户近 60 年以后，中国终于意识到必须进行龚自珍所呼唤已久的变革，并真正开始实行，然后又很快失败，最终代之于一场更为激烈的革命。

一切都要从中国的对外关系谈起。

二、以夏变夷

数千年以来，在中国与周围非中国人的交往中，中国一向自视为天之中心，而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则光被四表。周边民族乃蛮、乃戎、乃狄、乃夷，这些带有浓厚蔑视意味的称呼，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的《禹贡》篇中，就提出了一个同心圆式的等级理论：

王城以外的五百里属于甸服。相距王城一百里者，将剩下的庄稼贡来；二百里者，将庄稼的穗头贡来；三百里者，将庄稼脱去芒尖贡来；四百里者贡粟；五百里者贡米。

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其间百里者，人民为国王服各种劳役；二百里者，人民为国王服规定的劳役；三百里以外者，人民要担任戍守之责。

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其间三百里以内者要设立掌管文教的官来推行文教；三百里以外的人民要勤奋地熟悉武事，以便保卫国王。

绥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要服。其间三百里以内的人民要遵守与其它地方大体相同的政令；三百里以外的人民，可以依次减轻赋税。

要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荒服。对其间三百里以内的人民的各种要求可以从简；三百里以外的人民可以流动迁徙。

尽管地理距离越大的蛮夷与皇帝的关系越冷淡，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天子的臣民，天子的德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讫于四海”。在《禹贡》创作的时代，如此广大的统治区域显然仅是一个理想，然而，在二千年之后，这个理想却是近于实现了。除了行政疆域的辽阔和控制范围的广大之外，更值得中国人夸耀的乃是汉文化的优越性，正是这种先进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人几次被异族统治，却又几次同化了异族。尽管我们有过五胡乱华，有过元蒙入侵，甚至中国最伟大的盛世——唐朝君主的族源亦被怀疑为有异族的血统，但无论如何，最终都是汉文化同化了异族。最令人值得自豪的事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北魏。鲜卑——这个通过千辛万苦终于统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他的一代英主孝文帝的坚持下，居然迁都、改姓、易服饰，顺从汉族的礼制，使得这个原本强悍有力的民族终于消失了，准确地说是像盐溶于水一样，消溶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了。这足以令人欣慰地想到：也许我们的军队并非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我们的文化却绝对是战无不胜的。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不仅对于孟子本人，即使对于 18 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也绝不是虚骄的夸口，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于是我们拥有了一种信念，那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具有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

17 世纪以来，中国再一次被异族所统治。然而无需太多的担忧，那些统治中国的满族人似乎照例也被汉族文化所同化。不但如此，17—18 世纪的清朝政府在开疆拓土方面取得了可以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的丰功伟业，帮助汉族人将汉文化推广到更为广袤的边远地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康熙皇帝在 1682 至 1683 年收回了台湾，并且通过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把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后来他又在 1696 年战胜了以噶尔旦为首的西蒙古人（即准噶尔人），从而捍卫了清廷对东部外蒙古的控制。他的

孙子乾隆似乎继续着他的伟业，建立了所谓的“十全武功”，这其中包括对缅甸的远征（1766—1770年）、对越南北部的用兵（1788—1790年）、对台湾叛乱的镇压（1787—1788年）。而他更辉煌的功绩在于亚洲腹地。乾隆的军队在18世纪50年代在亚洲腹地歼灭了西部蒙古人，1760年又占领了塔里木盆地。同时，清廷又在1720年、1727—1728年和1750年派遣远征军进入拉萨，利用喇嘛教间接控制蒙古。1790—1792年两次对尼泊尔廓尔喀人的远征使得对西藏的用兵取得了最后的成功。尽管这其间也遇到过一些或大或小的麻烦，但是，中国文明的优越，中国军队的强大显然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也许是我们乐观的时间太长了。当时间推移到19世纪以后，中国人不得不在军事上、文化上开始面对一个强有力的手，这就是经过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和现代科技洗礼、代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的西方诸强。这时候的西方列强，年轻气盛、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具有扩张时期所特有的横蛮、血腥、残忍与骄傲，船坚炮利，枪精弹足。天朝大国开始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将迎接千古未有之挑战，而面对这一挑战的首脑人物乃是清朝历史上第六位皇帝——宣宗道光皇帝，名爱新觉罗旻宁。应该说，这位“个子矮小，形容枯槁，寡言鲜语，样子安详”的皇帝绝对不是迎接这一挑战的最佳人选，当然，也谈不上是最坏的人选。但是，最可怕的并不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圣明睿智的贤君，真正可怕的是，道光帝乃至清政府的全体官员对已经崛起于西方的列强还懵然无知，对大清帝国的迟滞落后毫无警觉，整日沉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更不用提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下层民众。造成这种对世界知识过分无知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执行的闭关政策。

三、睥睨与防范

众所周知，汉唐以来，中国是一个极为重视对外开放的国度，尽管这种开放最初的驱动力不过是贪婪、虚荣和自大。当朝的君主只不过希望能够炫耀帝国的繁荣强盛并得到尽可能多的奇珍异宝——只要我们看一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野史中对于他国进贡的珍奇宝物那种充满渴望与歆羡的描写就可知道；而且中国人乃是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屡屡表示出对异族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对于非汉族的文明从来就缺乏起码的尊重，但它客观上造成的后果却是异常积极的。汉、唐，尤其是唐朝时的中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气魄最雄大、胸襟最广阔的强国。到了元朝统治时期，中国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誉远及欧亚非三洲。西方各国前往中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络绎于途。除陆路交通之外，更有海上通路，如泉州，就已成为古代世界著名的对外港口。东起朝鲜半岛，中及东南亚地区，西至印度洋、波斯湾及至非洲东北部广大地区，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商和货船云集于泉州港，堪称为沟通亚、非国家的巨港。到明朝时，更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中西文化交通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足迹。这样一个具有对外开放传统的伟大国家怎么会执行起闭关政策了呢？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曰外患，一曰内乱。

中国第一次海禁发生在 1523 年，主要是针对葡萄牙。葡萄牙 1514 年就侵犯我东南海面，劫夺商旅，贩运违禁物品，掠卖人口，甚至袭击广东沿海地区。为了打击这种海盗行为，明朝政府于 1523 年（世宗嘉靖二年）在广东新会海面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击败了葡萄牙商船，并缴获其佛朗机炮。从这年起，明朝政府即严禁与葡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

顺治时，南明将领郑成功、张煌言等据东南沿海开展抗清斗争。清朝政府为了防范汉族人民的反抗，曾下令“海禁”和“迁海”，片板不许下海，对闽、广、苏、浙等各省沿海居民，逼令内迁三十里；焚毁沿海城郭庐舍，有越界者立斩。

直到 1663 年台湾郑氏降清，康熙帝才下令废除海禁，开海贸易。尽管这些措施伴随着相当严苛的条件，但无论如何，在此期间清朝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随着海上商业的发展，清朝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也日益严格，乾隆、嘉庆年间，闭关自守的政策发展到了极点。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由于英国人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专谕外国商人，从这一年开始，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不得再往厦门、宁波等地。同时，清政府又制定了很多限制外商的禁例，如《防范外夷规条》、《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人章程》等，禁止外商在广东省过冬，外商需听中国行商的管束等等。另外，又通过加税、设立公行制度等等，使得外商来中国通商受到了极大的挫折。清朝政府还禁止中国商人制造海船，对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严加限制。这些政策，加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使得外国商品在中国很难畅销，而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蔗糖却深受欧洲用户的欢迎。闭关政策从表面上看有着明显的短期利益，它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地位，因为外商只好用白银购买中国的出口货物。英国是当时对华贸易额最大的国家，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在中英贸易中，中国总是顺差，英国的白银不断流入中国。

与此相反，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羡慕、向往着东方。16 世纪，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花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孜孜以求地进取，不断地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这种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中国的君臣时不惜卑躬屈膝，以自尊为代价，没有后来那